

# 年号：神传文明的宝藏

文 / 平心

2019年，日本的年号从“平成”改元“令和”的新闻引起了许多人的热议，很多中国人也重新探讨起了年号这个沉寂已久的话题。也有许多人疑惑，为何创立于中国的年号文化，却最终在中国消失了？年号的发展到底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？而年号制度对我们中国人又意味着什么？当我们翻开历史的画卷，展现在面前的竟是一座由神传文明所构建起的宏伟殿堂。

## 年号的奠定

众所周知，年号纪年法是汉武帝创立的，两千年来一直是中国的各个朝代的纪年方式。据《史记》记载，官员建议汉武帝用祥瑞的天象和征兆作为帝王的年号。“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，不宜以一二数。一元曰建元，二元以长星曰元光，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曰元狩云。”汉武帝便纳了这种建议，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年号命名为建元，预示着中国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。

自汉武帝登基以来，大力施行新政，推崇儒术治国，这一举动触怒了当时信奉黄老之学的窦太后。无奈武帝只得搁置改革措施。直到建元五年（公元前136年），窦太后突然去世。

公元前134年，天上出现了一颗彗星。古代占星术发达，能根据星的运行、分野和气象的征兆等等来预测人事。

“彗，所以除旧布新也。”（《左传》）古人认为，彗星的出现是除旧布新的征兆，属于重大的天象变化。因其在天空中留下的长长的彗尾，故民间也把彗星称为“扫帚星”。

彗星的出现预示着汉武帝革除旧政，推行新政的举措。窦太后死后，汉武帝下诏恢复博士官，召回之前被罢黜的儒生，大汉朝至此改弦更张，变守成为尚功，并即将成长为雄居东方的强大帝国。为顺应这种除旧布新的天象，故称年号为元光。

公元前122年，“元狩元年冬十月，行幸雍，祠五畤。获白麟，作《白麟之歌》。”（《汉书》）汉武帝郊祭的时候捕获了一只麒麟，创作《白麟之歌》，称年号为元狩。麒麟是一种仁兽，麋身，牛尾，马足，五色，鬃蹄，一角，古人认为王者德至鸟兽则麒麟出，是一种非常吉祥的征兆。

公元前113年，汉朝又出现了一件奇事。“其夏六月中，汾阴巫锦为民祠魏后土旁，见地如钩状，培视得鼎。鼎大异于众鼎，文镂母款识，怪之，言吏。”（《史记》）。百姓在祭祀时，看到地面隆起呈钩子的形状，挖开一看，竟然是一只不同寻常的大鼎。

鼎是皇权的象征，国之重器。伏羲造鼎表示一统。黄帝铸鼎三只，象征天地人三才。大禹铸九鼎以祭祀天地神明，当时九鼎铸成之后，一些山林川泽中鬼魅因此不敢现身了。“昔禹收九牧之金，铸鼎荆山之下，入山林川泽，魍魉蝮，莫能逢之，以协承天休。”（《说文》）

宝鼎的出现乃是上天显示的符瑞，这也直接影响了汉武帝之后决定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。当时有大



汉武帝

臣向汉武帝建言：“宝鼎出而与神通，封禅。”用宝鼎祭祀可以沟通天地神明，而封禅则是最为盛大的祭祀活动。

现在认为，封禅是皇帝将自己的功绩告知上天的举动，表明自己秉承天命的一种方式，以此来祈求神的保佑。而人们往往忽略了其中也有武帝效仿黄帝当年鼎铸修德，封禅泰山，怀求仙修炼之大愿。

当年黄帝带领群臣一边作战一边修炼，他开采首山的铜矿而铸宝鼎，鼎铸成后，有一条龙从天而降，带领群臣和嫔妃七十余人飞升而去。而未修成的臣子们，拽着龙须也想一同上天，可最后都被甩了下来。没修成的人抱着黄帝的弓嚎啕大哭，后人便把那张弓称为“乌号”，把黄帝飞升处称为鼎湖。这是一次非常壮观的神迹展现，其事迹也以武帝与大臣对话的形式被记录在了《史记》中。

汉武帝在听完黄帝飞升的事迹后说道：“嗟乎！吾诚得如黄帝，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。”对比修炼，汉武帝将亲情视为可以随时脱掉的鞋子，足以证明他的悟性很高，根基非凡。

汉武帝因宝鼎的出现而改年号为元鼎。而后又效仿黄帝封禅泰山，改年号为元封。公元前104年，汉武帝为了颁布新历法举办了盛大的典礼，此历法以正月为岁首，采用有利于农时的二十四节气，取代了秦汉以来的《颛顼历》，并把那一年定为太初元年，新历法也因此得名《太初历》。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通过年号这种形式，被印刻在了中华传统文化之中永远流传了下来。

## 年号的发展演变

为了奠定年号文化，神进行了系统有序的安排。故而从年号的创立之初，就显示出了皇权就与天地

神明之间的联系，古人谓之君权神授。而历代的君王为了上顺天道、下和万民，在更改年号的过程中，经常使用诸如天、乾、永、建、神、龙、凤、大、太、元、延、正、光、景、开、嘉等有纪念、宏大、神圣、开创、祈福之寓意的美好中正之词汇。

当然，在为年号命名时，有许多直接出自《道德经》、《周易》等一些道家经典，其中“明道若昧，进道若退，夷道若类。上德若谷，大白若辱，广德若不足，建德若偷。”（《道德经》）只短短两句话，就衍生出了如“明道”、“上德”、“广德”、“建德”这四个年号。

古代许多帝王尊崇老子，将无为而治视为为政的最高标准。皇帝虽贵为天子，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他们更像是神选定的“修炼者”，每当修炼有成，如能平乱、安民、勤修德政、整饬吏治，上天就会显示以祥瑞。如皇帝怠慢“修炼”，导致政治昏聩、内忧外患等一系列问题，上天则会以异象警示，如皇帝不知悔改，上天就会降下灾难。

因此在年号的命名上，许多帝王会因天下出现的祥瑞之事而改元。如汉宣帝时期，“二年春二月，诏曰：‘乃者正月乙丑，凤皇、甘露降集京师，群鸟从以万数。朕之不德，屡获天福，祇事不怠，其赦天下。’”（《汉书》）汉宣帝因出现凤凰翔集，天降甘露与皇官之内种种祥瑞而改元“甘露”。

唐高宗之时，（公元664年）“去年绛州麟见，又含元殿前麟趾见，于是改元。”（《资治通鉴》）因出现麒麟而改元麟德。

祥瑞是上天的鼓励，意在期待帝王做的更好，可有的皇帝却沉迷祥瑞。这不可避免的让许多小人有可乘之机，因此投其所好，编造各种祥瑞来博取皇帝的信任，如不

能明辨，则与国危害甚大。

唐太宗深知帝王沉迷祥瑞的害处，曾对大臣说“朕此见众议以祥瑞为美事，颇有表贺庆。如朕本心，但使天下太平，家给人足，虽无祥瑞，亦可比德于尧、舜。若百姓不足，夷狄内侵，纵有芝草遍街衢，凤凰巢苑圃，亦何异于桀、纣？尝闻石勒时，有郡吏燃理木，煮白雉肉吃，岂得称为明主耶？又隋文帝深爱祥瑞，遣秘书监王劼著衣冠，在朝堂对使焚香，读《皇隋感瑞经》。旧尝见传说此事，实以为可笑。夫为人君，当须至公理天下，以得万姓之欢心。若尧、舜在上，百姓敬之如天地，爱之如父母，动作兴事，人皆乐之，发号施令，人皆悦之，此是大祥瑞也。自此以后诸州所有祥瑞，并不用申奏。”

真正的圣明的帝王，不会为祥瑞而动心。这也表现在了唐太宗的年号“贞观”二字中。贞观取自《周易·系辞下》：“天地之道，贞观者也。”太宗朝以贞观为年号并沿用一生，为后世展现了何为正道治国之典范。贞观短虽二字，在中国人心中却有着极重的分量。

蒙古族入主中原后，建立了举世无双的强大帝国，公元1264年，元世祖忽必烈改年号为至元并使用长达31年，至元二字同样出自于《周易》，乃至哉坤元之义。

到了明清时期，因考虑到烦琐更变年号而产生的不便，皇帝们除了登基时改元外，不再改换年号。因此，后世使用年号称呼起了皇帝，如“永乐大帝”、“嘉靖皇帝”、“康熙”、“雍正”、“乾隆”等。

## 因灾异而改元的启示

当然，与现代人不同，古人对灾难的产生和消弭有一套自己的认识。当天下发生较大的天灾时，有的帝王便会选择改元以禳灾。

汉宣帝时，公元前69年，“夏四月壬寅，郡国四十九地震，或山崩水出。”（《汉书》）当时发生了一起非常强的地震，连先祖的宗庙都毁坏了。

汉宣帝下诏说：“盖灾异者，天地之戒也。朕承洪业，奉宗庙，托于士民之上，未能和群生。乃者地震北海、琅邪，坏祖宗庙，朕甚惧焉。丞相、御史其与列侯、中二千石博问经学之士，有以应变，辅朕之不逮，毋有所讳。令三辅、太常、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各一人。律令有阙除以安百姓，条奏。被地震灾败甚者，勿收租赋。”（《汉书》）

汉宣帝认为，灾异是天地的警示，因不能“和群生”而致使天怒。于是改穿素服反省自己的过失，五日不上正殿。然后大赦天下，改元节。

也有许多人提出，为什么皇帝做的不好要老百姓来承担罪过。其实并非如此。生命是一个非常庞杂、庞大的系统。用人体比喻，皇帝象征着人的思想、内心，指导着人体做着各种事情。如思想想要熬夜、酗酒，过后身体就会感觉疲惫、呕吐或者生病。实际上就是提醒自己，这样的做法，对身体是有危害的。所以人就会选择吃药、调整作息以及戒除不良嗜好等一些方式来改善身体，回归正道。其实这种身体反应出来的负反馈和上天发出异象是非常相似的。

可人人又都是个体生命，生生世世做了很多坏事。神只不过是利用人自身的业力用以惩罚人和警示帝王。因为天地的法则是绝对的公平的。被惩罚的人也并非就落入万劫不复的地步。如果此人因此而还清了业债，过后便会得到幸福。

其实恶报也是神仍在看护着人的一种特殊的表现。但如果皇帝敬天信神、勤修德政、善化民众，也会使得这种灾难减轻或者消失，那是神看人变好而为人所承受的。

顺带一提，与帝王改元相似，许多人在经历了一些变故或人生不顺遂时会改名，目的是为了改变运势。实际上，想要改变运势除了敬天信神、修德做好事外，用其他方式几乎是不可能办到的。即便一时可行，那也只是把磨难推迟到了后半生或以后去了。只有真正洗心革面、重新做好，那才是正途，而改名只是一种表面形式，意在告诉上天自己要与错误的过去决裂，有点作用，但不是关键。这也使得许多不明就里的人舍本逐末，错把改名当成趋吉避祸的唯一方式。

比较典型的例子还有宋仁宗。公元1034年，他因连年大旱改元“景祐”。庆历九年（公元1049年），又因大旱改元“皇祐”。后又因日蚀而改元“至和”。无不是这种思想的反映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人的道德逐渐下滑，人与神的距离越来越远，神迹和祥瑞也越来越不展现在世人面前，特别是自中共篡权以来，大肆宣扬无神论，咒天骂地，强行割裂人与神之间的联系。

在中共对中国传统文化斩草除根式的灭绝的同时，传承千年的年号制度也被一同拔除。民众在谎言中成长，在斗争哲学中生存，丧失了分别善与恶、真与假、美与丑的能力。

在对待天灾异象时，中共有着一整套丧事喜办的流程和所谓的“科学”解释，与几千年来的历代统治者那种反求诸己的思想观念截然相反。

因而人们发现，各种天灾异象越来越频繁、越来越极端。现代人把它笼统的归结为自然现象，不再探讨天与地、神与人之间的关系。

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，中华大地接连爆发了非典和新冠的瘟疫大流行。人们惊奇的发现，共产党员和那些盲从中共的人密集病亡。可中共仍旧维持老一套，一边极力掩盖死亡人数，一边大谈抗疫胜利。其实明白人都知道，这是中共因迫害法轮大法引来的天劫。正如董仲舒所言：“国家将有失道之败，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，不知自省，又出怪异以警惧之，尚不知变，而伤败乃至。”

## 结语

年号，是一本浓缩了的历史书，当我们偶然读到“康乾盛世”、“贞观之治”时，那藏于年号中的巨大信息量会以极快的速度被唤醒，似乎历史的沧桑变幻、兴衰荣辱早已融进了我们的血液。在这座神传文明所构建起的殿堂中，年号文化熠熠生辉，它将古人的智慧进行了高度凝练的总结，并试图告诉我们，敬天信神、顺天而行方是我们保全自己、延续文明的唯一正途。◎

# 话传统运动——踢毽子

文 / 新竹

踢毽子是我国传统的体育运动，是古代“博戏”的一种。中国人踢毽子的历史很长，在汉代的画像砖上已有踢毽者的形象了。古人认为踢毽子最初来源于蹴鞠，而蹴鞠相传为黄帝所作。这么看来，这小小的毽子，其来历也非同寻常。

毽子的组成很简单，为毽铤和毽羽两部分，毽铤多用铅、锡或几片铜钱，而毽羽则多用鸡羽，制作起来非常方便，因此也有利于这项运动的传播，甚至成为一些地区过年过节的“岁时”活动。承德便是其中之一，当时几乎是户户有毽，人人会踢。到了新年，人们便三五成群，上街踢毽。而广州人则会于元宵节那天举办毽子会，踢者甚众，亦是热闹非凡。

踢毽子的方法很多，“有里

外廉、抱枪、耸膝、突肚、佛顶珠、剪刀抛之名色”（《燕京岁时记》）踢毽子可以边跑边踢，除了用脚踢，还可以使用膝盖、腹部、头部玩出各种花式。

《帝京岁时纪胜》记载“都门有专业踢毽者，手舞足蹈，不少停息，若首若面，若背若胸，团转相击，随其高下，动合机宜，不致坠落，亦博戏中之绝技矣。”清朝光绪年间，承德有个百岁老人，能踢出金龙探爪、喜鹊登枝、狮子滚绣球等上百种花式。

由于踢毽子花样繁多，可难可易，因此也常常受到古代女性的欢迎。古诗云：“青泉万迭难朝飞，闲蹴鸾靴趁短衣。忘却玉弓相笑倦，攒花日夕未曾归。”女孩们踢着、嬉笑着，玩得痛快了，索性脱掉外套。一直踢到夕阳西下，女孩们都笑倦了，还留恋于攒花的乐趣之中。此攒花即是踢毽子的

其中一种，女孩们不知疲倦地踢毽子的样子，足见其带给人们的欢乐。

当然，这么好玩的踢毽子，不只是寻常百姓的专属，就连光绪皇帝的瑾妃也都非常喜欢。午休完，瑾妃常常与大家一起踢毽子。踢毽时，她要把大衣襟的下摆塞在腰带上。有时还把毽子踢的很高，踢到前殿的匾后面。这时，就唤来小太监，用竹竿挑下来再接着踢。瑾妃一踢起毽子就停不下来，常常踢到晚饭时间才肯罢休。

踢毽子既锻炼了身体，又能从中获得十足的乐趣，因此能根植民间，延续千年不衰。记得笔者小时候，踢毽子还是一种比较热门的娱乐活动。可现在的孩子们，被电脑、电视、手机等电子鸦片所包围，似乎再也体会不到我们儿时的那种快乐了。◎

